

慶祝王元化教授 八十歲論文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慶 祝

王元化教授八十歲

論 文 集



本書編委會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編委會編. -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1

ISBN 7-5617-2402-0

I. 慶… II. 慶… III. 文學理論-文集
IV. I0-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57329 號

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

本書編委會

責任編輯 李惠明

特約編輯 傅惠生(英文) 陳麗菲(日文)

責任校對 喬惠文 邱紅穗 郭紹玲

封面設計 高山

版式設計 蔣克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發行部 電話 021-62571961

傳真 021-62860410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印刷者 上海新文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6 開

印張 27.75

字數 66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

印數 2000

書號 ISBN 7-5617-2402-0/C·067

定價 47.0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王元化教授

目 錄

序·····	錢仲聯(1)
談王元化·····	錢谷融(1)
王元化學術年表·····	錢 鋼(6)
王元化著述目錄(1947—1998) ·····	(47)

關於中國美學的一點斷想

——為老友王元化教授八秩華誕壽·····	季羨林(50)
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	湯一介(52)
從世界文化史看樞軸時代·····	張 灝(65)
天人之學述論·····	龐 樸(75)
“東夏”解·····	裘錫圭(89)
《小開》確記月食·····	李學勤(94)
魏晉南北朝時文壇上的摹擬之風·····	周勛初(97)
梁庾元威論《說文解字》·····	饒宗頤(102)
《文心雕龍》為何不論述漢魏六朝小說? ·····	王運熙(105)
六朝貴族文人的懦怯和虛榮·····	岡村 繁(109)
權力、教育與思想世界	
——關於唐代思想史背景的研究之一·····	葛兆光(117)
宋代“國是”考釋·····	余英時(122)
論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構成·····	王水照(140)
日藏明王惟儉《文心雕龍訓故》本之考察·····	王更生(151)
《文心雕龍》主要版本源流考略·····	林其銓(159)
論黃宗羲對於孟子的理解·····	劉述先(166)
《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序·····	錢仲聯(175)
雍正墨跡及文房四寶·····	楊啓樵(176)
晚清的經今文學·····	朱維鈞(184)
讀《龔自珍全集》札記二則·····	樊克政(197)
論理雅各譯注《書經》、《竹書紀年》的文獻考證 ·····	劉家和 邵東方(202)

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	
——以《點石齋畫報》為中心	陳平原(223)
晚清的旅日詞人孫點	李慶(262)
裂變年代的文化衝突	
——試論民國初年新舊觀念間矛盾的激化	丁偉志(269)
論啟蒙與“反傳統”	
——五四運動與凱末爾革命的比較	陳方正(278)
對於胡適、毛子水、與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	
——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或理想型)的分析”	林毓生(287)
魯迅的前期和後期	
——以“人性的解放”為中心	章培恒(298)
蒙文通與道家	蕭蓬父(307)
略論二十一世紀《漢譯佛典語言詞典》的編纂	徐文堪(316)
民間文學的人類學研究	李亦園(321)
要從形象憧憬進到真知	周策縱(330)
王維の詩にわける月の描写	興膳宏(332)
Chinese Utopianism on the Defensine?	Thomas A. Metzger(墨子刻)(338)
Dimensions of Objectivism and Subjectivism in Chinese Thought;	
<i>Dai Zhen's</i> Critique of Daoism	Torbjörn Lodén(羅多弼)(358)
The <i>Zhuang Zi</i> : Its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Victor H. Mair(梅維恒)(372)
Incomplete Modernity: Rethink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	Leo Ou-fan Lee(李歐梵)(387)
ONTO-EPISTEMOLOGY OF SUDDEN ENLIGHTENMENT IN	
CHAN BUDDHISM	Chung-Ying Cheng(成中英)(413)
A little talk on little poems(小詩小話)	N.G.D. Malmqvist(馬悅然)(428)
後記	(438)

談 王 元 化

錢 谷 融

記得在陳丹燕的一篇文章中曾看到有“錢谷融說王元化的眼睛很像梵高”之類的話。其實這是丹燕的誤記。我在談話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梵高的名字。但我確曾說過王元化的眼睛有點像尼采。我甚至覺得除了尼采，還有茨威格，還有馬雅可夫斯基，他們的眼睛，不知怎的都使我感到與王元化的似乎有某種相類似的。眼睛有關於神明，要認識、了解一個人，最好是看他的眼睛。但無論是尼采，還是茨威格、馬雅可夫斯基，我都從來沒有見到過。我所見過的，只是他們的照片而已。照片上的眼睛是已經定型化了的，凝固不動的了。但高明的攝影師，常常能捕捉住對象的眼神或在一瞬間所放射出來的特有的光芒。正是這些人眼中所特有的光芒，我在王元化的眼中也常常看到。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光芒呢？這種光芒，是只有當一個人在思想高度集中時，當他全身心地為某個對象所緊緊吸引住了的時候，就是說，只有當他陷於十分專注的出神狀態的時候才會有的。這樣的狀態，在任何一個人的一生中，是都會有可能出現的。但對一般人來說，這種狀態是難得出現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在王元化，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尼采、茨威格、馬雅可夫斯基等人來說，却是經常出現的，這是他們的常態。他們就是經常生活在這種專注、出神的狀態之中的。

這樣的人，一定是個遇事十分認真、充滿了探索精神的人，是隨時能夠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客觀事物（自己探索的對象）身上去的人。但同時，他又決不喪失自己的獨立精神。甚至會當仁不讓地以對象的主宰自居，認為自己的心靈足以權衡裁制一切。所以這樣的人往往高視闊步，目無余子，難免有一些獨斷的傾向。譬如王元化，你看他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要窮根尋柢，究明它的來龍去脈，然後一無依傍，獨出心裁，作出自己的判斷。盡管他的態度十分謙虛，決不說自己的主張就是絕對正確的，而且也真誠地歡迎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來與他商榷，但在骨子裡，他是十分自信的，他的主張不是輕易動搖得了的。本來嘛，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都不會不經研究就輕率地對學術問題隨便發表意見，當然也就不會不經驗證就輕率地隨便放棄這個意見了。在學術討論中，應該唯真理是尚。在真理面前，能夠不固執己見、從善如流的風格固然值得贊賞，值得發揚；而那種百折不撓，始終堅持正確意見的精神，同樣是十分難得、十分可貴的。學術的前進與發展，離開了這種認真堅持的精神，也是不可能真正取得的。

說到王元化的堅持精神，確是相當突出的，他常常被人們認為固執。他認定了一條路，就要走到底；確立了一種主張，就會抓住不放。除非能使他相信此路確實不通；或者有足夠

的證據證明這個主張確實站不住，他是不會輕易改道，輕易放棄的。在他那里，治學與做人是一致的。對真理的執著，也就是對人的精神力量、對自我人格的尊重。帕斯卡爾說過：“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王元化堅持自己的思想信念，也就是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堅持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1955年他因胡風問題牽連而被隔離審查，周揚曾經提出建議，只要王元化承認胡風集團的問題是屬於反革命性質，就盡量將他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王元化不會不知道胡風是反革命的結論是上面欽定的，他應該清楚他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卻寧可自己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決不肯違背自己的良知去承認胡風是反革命。這種鐵骨錚錚的品格，可與1959年馬寅初的拒絕檢討相媲美。馬寅初是因為在人口問題上的言論與最高領導的意見相左而受到批判，批判的來勢非常凶猛，一些好心朋友就勸馬寅初檢討一下，認一個錯了事。馬老為此在《新建設》上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以明志。他不但堅持自己的主張，還特地寫了一段“附帶聲明”，說：“學術問題貴乎爭辯，不宜一遇襲擊，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頭……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這些話真是擲地有聲，不但一切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應當牢牢记取，就是那些身居要職、手操生殺大權的人，又何嘗不該認真傾聽呢？當時馬寅初已是八十老翁，而王元化則剛過而立之年，但兩人所遭遇的問題的嚴重性則是相同的。中國知識分子歷來都有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的優良傳統，雖屢遭歷代統治者的摧折，但此種風骨至今綿延不絕。中華民族之所以能長存不衰，光耀千秋，蓋亦有賴於此。但願凡我同胞，無問上下，都能明白這個道理就好。

王元化不但敢于堅持真理，同時也不憚于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他決不是那種自詡一貫正確、到處津津樂道地宣揚自己的光輝業績，避而不談甚至有意隱瞞自己有過的缺失和犯過的錯誤的人。他曾坦言：“我曾經陷入過機械論，發表過片面過激的意見。”承認在文藝觀點和政治觀點方面不但出現過“幼稚的理想主義”，還存在着一種“近于自欺的愚忱”（見《思辨短簡·後記》）。在《思辨發微·序》中，他鄭重其事地訂正了他過去相信黑格爾說的人性惡要比人性善深刻得多的意見，明確地認為這是個錯誤觀點，並聯帶談到了他過去對韓非的認識的錯誤。他1976年在《韓非論稿》中曾認為韓非主要繼承的是申不害和商鞅的衣鉢，而與荀子的性惡論並無多大關係。現在則認識到韓非的重術觀不過是把荀子的性惡論發展到極端罷了。在同一文中，他也談到他和林毓生之間發生過的激烈爭論，以及對朱學勤所寫的關於《傳統與反傳統》的書評的不滿。盡管後來他和這二人在意見上仍有分歧，却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私人關係，反而因此而同他們成了朋友，從這裡可以看到王元化的真正的學人品格。熊十力在論及莊子與惠施之間的關係時，曾贊嘆道：“二人學術不同，卒成知友，博學知服，後人無此懿德也。”在王元化身上，似乎也並不缺少這種類似的美德。

《思辨發微·序》文雖不長，却很值得重視。尤其在提到韓非與荀子的關係時所說的一些話更應受到注意。王元化認為荀子雖然是性惡論者，但他認為人性雖惡仍可以通過外在力量加以改造。而韓非卻把荀子的性惡論推向了極端，作為極端的性惡論者，他就根本不承認人性中還有什麼善的因素。既然人性中並不存在“善的基因”，那麼“不管強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惡為善是不可能的。”因而就導致韓非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只有利用人的利賞惡罰的自為心，才可令其聽命就範。”這也就是韓非為統治者所設計的一套治民妙法。王元化不無憤懣地指出，在性惡論者看來，人是醜惡的、自私的、卑賤的，因而他們決不會相信人，更

不會尊重人。他說：“過去我只對韓非的法、術、勢深為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惡論的實質，我不禁對這種慘刻理論感到毛骨悚然。它給天下蒼生帶來多少苦難！”王元化這些話，真是慨乎言之，其中該是凝結着有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多少血淚呵！王元化深信並莊嚴地宣告：“人的尊嚴是不可侮的。”接下去，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青年時代，我在一本通俗小冊子里讀到伽里略的事跡，我一直記得伽里略創地動說受到教廷審判宣告自己錯誤的情景，當這一切完畢以後，他懷着屈辱站起來說：‘可是地球還是動着的！’至今我一想到這事，我的心仍會感到戰慄。思想是古怪的東西。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讀了這些以後，人們大概也就不難明白王元化在壓力面前為什麼能夠那麼堅強，他的堅毅品格究竟是如何養成的了。

作為一個學者，王元化總是在不斷的思考與探索，他的著作，往往離不開一個“思”字，如《文學沉思錄》、《思辨短簡》、《思辨隨筆》、《清園近思錄》等等。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點，那就只有這個“思”字了。從理論上來說，思想是最自由、最不受拘束的。但事實上，思想又很難得到真正的自由。不但常常要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干涉，有時甚至會被嚴重地禁錮起來，使得有生之靈的人們只能陷入不死不活的狀態之中。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這種現象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中國知識分子由于長期受到封建統治的重重壓制，就喪失了自我的獨立自主的精神，思想上大都循規蹈矩，陳陳相因，不敢越雷池一步，少有大膽創新的意見發表。這是學術工作的大忌，不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的學術就很難得到迅速的發展。所以王元化不止一次地發出了這樣的呼吁：“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擺脫長期以來的傳統依附地位，找回自我。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並由此形成獨立意識和獨立見解。”他最服膺德國古典哲學的批評精神——不承認任何外界權威，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提倡獨立思考。強調“理論的生命在於勇敢和真誠”。而他在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工作和學術論著中，也的確始終是一往直前、義無反顧地這樣實踐着，堅持着的。他是一個學者，但並不是一個整天待在書房裏的恂恂如也的學者，而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鋒芒畢露的鬥士型的學者。他敢於對社會上和學術界已有的成說、已有的定評提出質疑和挑戰。譬如對“五四”，對杜亞泉其人等等，他都提出了許多不同於過去的看法，他在學術論辯中，不作意氣之爭，不逞口舌之利，只在學理上做文章。無論是對對方的駁難，還是對己見的闡明，都力求有理有據，進行多方面多層次的論證。言辭雖時或不免尖銳，但決不越出學理範圍，始終注意保持學術論爭的純潔性。他又常常進行自我反省，對自己的學術見解不斷作出深刻的反思。一旦發現了自己的疏漏或缺失，或是別人的意見對自己有所啟發或幫助，他就公開說明，並對自己的意見作出修正。這種虛己服善的態度，實在是一種美德，一種在學術討論中應該大加發揚的精神。

這裏不妨談一下王元化對“五四”的看法。王元化在他的文章中曾多次談到過“五四”，並曾先後在南京、上海、杭州、鄭州等多所高等院校中作過關於“五四”的學術講演。後來又應人之請將這些講演的內容歸納為六點要旨，由他口述經人記錄成文，以《王元化對“五四”的思考》為題，收入《清園近思錄》一書中。我認為在他所歸納出的六點要旨中，特別重要的是他關於“五四”主要精神及其成就與缺失的認識。歷來都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是“文白之爭”和“新舊之爭”，其主要精神則是在於提倡科學與民主。王元化認為無論是“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都不能完整地概括“五四”文化論爭的性質。至於“民主”與“科學”，當時雖然

喊得很響亮，但是僅只停留在口號上，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却十分膚淺，甚至可以說是茫然無知，就簡單地把它們作為五四思潮的主要精神，是大可懷疑的。在王元化看來，“五四”的主要成就，是在於個性解放方面，當時掀起的波瀾壯闊的個性解放運動，使人們認識到在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地位，從而在思想上、精神上開始樹立起了獨立自主的觀念。近年來受到學界重視的“獨立의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正是五四時期所大力提倡和鼓吹的，正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徵。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王元化認為是“值得我們近代思想史大書特書的”。至于“五四”的缺失，王元化認為主要表現在當時流行的四種觀點上。他指的四種觀點即：庸俗進化觀、激進主義、功利主義和意圖倫理。他並一一指出了它們的偏向和危害。庸俗進化觀逐漸演變為僵硬地斷言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激進主義則成了後來極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義使學術失去其自身獨立的目的而成為為自身以外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意圖倫理則是先確立擁護什麼和反對什麼的立場，而不是實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問題放在首位。而且，確如王元化所說：“隨着時間的進展，它們對於我國文化建設越來越帶來了不良影響。”大家只要稍稍回顧一下最近五十年來國內理論界的一些情況，就不難發現這四種觀點確是風行一時、具有某種權威性的。像我們這些人不也曾經懾服於這類理論的威力之下，甚至就在自己身上不也曾經出現過這類理論的影蹤嗎？不過我認為，這些觀點雖然確乎發端和形成於“五四”時期，而後來的變本加厲並取得統治的地位（特別是其中的意圖倫理觀），却是四十年代以後的事，這王元化就沒有進一步去加以分析論證了。

郭紹虞在一篇回憶朱自清的文章里，曾說朱自清不英銳而沉潛，不激烈而雍容。我覺得王元化却是既英銳而沉潛，既激烈而又雍容的。通過多年來同他的接觸，我在他身上既看到了他的英銳而激烈的一面，也看到了他的沉潛而雍容的一面。他是非常健談的，跟他在一起，你簡直插不上嘴，他總是神采飛揚、意氣風發地高談闊論。有時偶然碰到他剛寫好一篇文章，他會興致勃勃、神情專注地當場朗讀給你聽。讀到得意之處，他會放慢速度、提高聲浪、同時臉上綻發出爽快的笑容來，就像孩子一般的率真。在一旁聆聽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景，也不禁會深深地被他所吸引住，和他一同陶然地分享內心的歡快。在對談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見，都會直率地說出來，有時甚至會十分熱烈地與你大聲爭辯，在在顯示出他的英銳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慮的問題，他就會變得冷靜起來，沉着仔細地再三斟酌，然後作出判斷。這跟他學術著作中的嚴謹深刻一樣，又顯示出了他的沉潛的一面。而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愛護扶持，以及他行文時筆致的從容舒徐，則充分體現出了他氣度的雍容。我認識王元化較遲，已經是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在同他交往的將近四十年來，我發現他身上的英銳激烈之氣雖依然未盡消退，但那沉潛雍容的一面則顯然愈形突出、愈顯得醇厚了。這自然是與他這些年來所得的閱歷和學養有關。聽李子雲說，王元化早年可不像現在這樣溫和，那是頗多狂傲之氣的。這我完全相信。即使現在，他的狂傲之氣似乎還並未消磨淨盡，還是有許多不够隨和、不大好說話的地方。譬如對於一篇文章的遣字造句，對於一本書籍的裝幀印刷，他都決不肯含糊，要再三提出修改意見，甚至近於挑剔。所以在這些方面跟他打交道，是不很容易的。我想這是由于他是個美和藝術的愛好者，他總在向往和追求一種完美的境界，只要看到任何一點不諧和之處，都會使他感到遺憾，不加改正他就不能心安。孟子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古代中國士大夫處世，往往追慕一種不夷不惠、亦

夷亦惠的境界。而王元化決不模稜兩可，他給人的印象是有伯夷之隘而無柳下惠之不恭。我沒有跟他談過陶淵明，相信他一定也會喜歡陶淵明的詩，欣賞陶淵明高遠恬淡的襟懷的。但對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的癖性，他就不見得會贊成。他雖不會主張不管讀哪一類書都要求得甚解，但總的來說，他是喜歡明確，喜歡透徹的；不弄清楚書上出現的問題，他是不肯輕易放手的。但他又決不是個刻板的、一臉孔嚴肅的人，他做學問雖嚴謹而並不拘泥；對學人雖少所許可而不失寬容。尤其對於年輕一代，只要有可取之處，他總是獎掖有加，提携唯恐不力。而且他是個重性情、講趣味的人，對朋友坦率真誠，決不假意敷衍。你看他的《記辛勞》那篇文章，該是寫得多好呵！不是有至性至情，對朋友真心相許的人是決寫不出來的。對於一切美麗的事物，他都特別的愛好，特別的鍾情，他對各種門類的藝術作品都多所涉獵，並有很高的鑒賞力。譬如對於京劇藝術，更可以稱得上是個真正的行家，跟他談余叔巖、談楊寶森，談到細微處，真可以說是妙入毫顛，使你領略到一種罕有的藝術快感。

王元化今年八十歲了，仍是意氣俊爽，器宇軒昂。他的父母都享高年，他一定也是個長壽的人。我不僅為他慶幸，也為中國文化能有這樣一位忠誠的護持者、光大者而感到高興。

1999年11月16日

王元化學術年表

錢 鋼

一九二零年 出生

祖籍湖北江陵。江陵是座古城，春秋時期楚國建都在此，即郢都。荊州城外八嶺山為楚國陵園，有楚莊王等三十多座楚王墳墓。王元化應邀為全國第一批二十座文化名城之一江陵的圖集作序，文中引“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舊典，稱江陵乃報仇雪耻之鄉。他也對學生說過，自己血管中有着楚蠻的血液。江陵在歷史上即以漆器和紡織品聞名，至今博物館內仍保存有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漆器和薄如蟬翼的絲織品殘片，其精密度為現代工藝所不及。《癸酉日記》稱：“母親常誇荊州緞如何精良，記得小時候我們家所用的被窩是以荊州緞作為被面。母親也常常講起荊州婦女多在紡織廠做工，可見清末這一帶紡織工業已很發達。”日記又稱：“小時聽父親說，家鄉一帶留下不少三國故事的遺迹，什麼‘張飛過河一拳一脚’，什麼‘咬草崖’等等。前者說的是張飛有急事要過江，受阻過不去，一怒之下，在一塊鉅石上打了一拳，留下一個比常人拳頭大數倍的拳頭凹痕，又踢了一腳，留下一個比常人腳大數倍腳印。‘咬草崖’也是一種傳說，相傳關雲長一次騎着他那赤兔馬，翻越一座險要的山嶺，行至懸崖峭壁，無路可走，馬只有咬着青草向上攀登。所以至今那裏生長的草，還是沒有草尖的。兒時聽了這些帶有傳奇性的故事，真是不禁神往。”

十一月三十日生於湖北武昌一個信仰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家庭。

父親王芳荃，字維周（一八八零～一九七五）。少時家貧，得教會資助，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一九零六年，與桂月華結婚，是年東渡日本，在東京志誠學校教授英語。次年得一女，取名中櫻，數年後夭折。返國後，一九一一年，進清華留美學堂教授英語。一九一三年，赴美留學，在芝加哥大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一九一五年，繼續在清華任教。學生中有梁思成、聞一多、陳植等。此後一直在教育界任職，先後在東北大學、北方交通大學任教授。王元化在書話《革命史譚》中說：“武昌起義時，父親到戰地去抬傷兵，民國成立後曾領到一張獎狀，父親把它配了鏡框，一直掛在牆上。”

王元化生下時祖父母已去世，只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姑媽、一個叔叔，但從未謀面。

母親桂月華（一八八七～一九八六），年輕時曾從一位北歐傳教士的女醫士學過醫，後在上海聖瑪麗女校攻讀。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記憶力很好，能背誦古人詩詞及清代閨閣詩人

所作彈詞，通英語。二十年代在清華時，常幫助丈夫潤色中文函牘。

外祖父桂美鵬在王元化誕生前已去世。書話《革命史譚》稱：“小時候常常聽到母親講述上代長輩的故事，她講述最多的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姓桂，諱美鵬，字搏九。他沒有走讀書人求功名的老路，而是在沙市當了一名傳教士。他還是沙市聖公會第一任中國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會務。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創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課的新式學校美鵬學堂（現改為新沙路小學）。我雖然從未見過外祖父，但從母親口中知道他舊學根柢很深，又像當時許多受到西學東漸影響的士人一樣，對西方存在着朦朧的嚮往，希望中國走西方富強的路。他曾向母親吐露他不懂西文的遺憾。母親說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又，《癸酉日記》稱：“母親經常向我們訴說的是，做牧師的外祖父和他的聖公會教堂，以及寄居他家的那些師爺們。外祖父的兩個妹妹，一個嫁出去了，因丈夫不良而忍受着折磨。另一個則是心腸柔軟，極富同情心，往往傾自己所有，甚至不惜脫下陪嫁的手上金鐲去周濟窮人。她一見到別人受苦受難就忍不住流淚，以至終於哭瞎了雙眼。還有鄰居家的那個可憐的養女，每天天不亮就拎着飯籃，裏面盛着粗糲的飯菜，摸黑趕到紡織廠去上班，她因害眼病，眼邊一圈全爛了……這些故事在我們的幼小心靈裏，曾激起了不少感情的波瀾。”

外祖母江太夫人性情慈祥。母系親族幾乎都是當時新式知識分子。母親是長女。舅舅桂質庭、四姨桂質良，先後均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美學堂赴美攻讀。桂質庭在美耶魯大學獲物理博士學位，生前是武漢大學教授。桂質良在美獲約翰霍甫金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嫁給聞一多的堂哥聞亦傳，除自開診所行醫外，並在聖約翰大學教授醫學。王元化小時和三姨母桂德華最親近。桂德華酷愛文學，曾去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求學，回國後任聖約翰大學等校教授，講授外國文學。她對王元化的文學愛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除長姊中櫻早年夭折外，王元化有三個姊姊，一個妹妹，均健在。大姊王元霽，燕京大學畢業，任中學化學教師，嫁魏光輝。二姊王元美，燕京大學畢業，從事話劇編導，嫁楊村彬。三姊桂碧清（從母姓，過繼給三姨母桂德華），上海幼兒師範畢業，從事幼兒教育及教授外國人漢語，未婚。妹妹王元兆，聖約翰大學畢業，在上海交通大學任職，嫁王浩川。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 一～五歲

未滿周歲即隨母親由武昌至北京與父親團聚，全家定居清華園南院。時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也住在清華園南院。清華由庚子賠款所建，學術氣氛濃厚。校園內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時稱清華四大建築，均在王元化到清華前後一二年中建成。一九九四年胡曉明在《一切誠念終當相遇》一文中說：“先生近年來多談及小時候的故事。如何與趙如蘭等小朋友嬉戲於清華南園；如何與熊秉明穿越一座大林子，到成志小學去上學，那林子裏只有蟋蟀的聲音叫破了寂靜；熊秉明又如何跌入淺水池塘，哭着回家，而他一副嚇壞了的樣子跟在後面……如何在父親的呵斥下出逃，又如何在母親的彈詞吟咏中恬然入睡。”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 五～六歲

北伐軍興，全家到上海，暑假後回北京。《革命史譚》說：“大革命時，父親鑒於北方局勢

緊張，一人留在清華，把母親和我們送到上海外婆處。那時三姨桂德華和外婆住在一起，她在聖彼得堂附小任校長。我和兩個姊姊被送到這家小學就讀。那時我只有五六歲，上的是幼兒園。”這期間還常被喜愛京劇的外祖母帶去看戲。

一九二六年三月，段祺瑞政府鎮壓抗日群眾，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慘案，死傷群眾數百人。罹難者中有清華學生韋杰三。清華大學舉行公祭時，幼兒園教師帶領王元化和一女童到會場，代表小朋友向韋杰三遺體鞠躬致哀。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 七～八歲

國民黨派羅家倫接管清華大學，王芳荃與羅牴牾，憤而辭職，去東北大學教書。全家搬出清華園，住在北平東城報房胡同。王元化則單獨寄居在清華園西院六姨母家，仍在清華附小成志小學讀書。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四年 九～十四歲

離開清華園，回到北平城裏父母家中，入孔德小學、育英小學讀書。在育英五年級時，患麻疹，在家養病，父親給他買來石印本七十回《金瓶梅》。這是王元化第一次閱讀我國古典小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母親因擔心在東北大學教書的父親遭遇不測而哭泣。為了紀念國耻，學校讓每個學生佩戴黑紗。事變十餘日後，父親逃出東北回到家裏。

一九三一年，遷家至東單西觀音寺（原趙元任寓所）。

一九三二年，讀初一時，語文老師閻潤之選魯迅《孔乙己》、《故鄉》等為教材。王元化第一次讀到魯迅作品，留下深刻印象。

一九三二年，日軍覬覦關內，蠢蠢欲動，全家逃難到湖北，寄居於武昌華中大學舅父桂質庭家。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是維周先生的同窗好友，哲學家，康德著作的中文譯者。王元化在《韋卓民遺著序》中說：“三十年代初，卓民先生在武昌華中大學主校政，那時我剛進中學，適值長城抗戰，北平局勢日緊，謠言紛傳。我們舉家南下暫避，整整一個暑假就寄居在華中大學校舍。這時我第一次見到卓民先生。當時他曾利用餘暇，授我們幾個孩子《大學》和《中庸》。暑假後，北方局勢暫告緩和，我們全家回到北平。”

回北平後，時日軍在北平恣意橫行，王元化在上學途中經常見到日軍在東交民巷練兵場附近耀武揚威，後竟荷槍實彈到領館區域以外練習打靶，坦克也開上大街，市民紛紛走避。祖國蒙受苦難，少年王元化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種子。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 十五～十六歲

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激起人民更大憤慨。王元化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九三六年，與李克（查先進）、夏淳（查恒祿）等一起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

讀育英中學高一時，被推選主編校刊《課外選課專頁》。第一次發表文章刊登在校刊專頁上，一篇是談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亞的戰爭，另一篇是談日貨走私。“復興社”學生勾結校方撤掉王元化校刊編輯。

一九三六年，因眼底回血管出血，在床上躺了近一年。家裏專門請人讀書給他聽。

是年王元化母親在西城小麻錢胡同租到一處寬大住房（原榮祿府的一部分），用了不少錢加以裝修。修葺未畢，蘆溝橋事變爆發。

一九三七年 十七歲

“七·七”事變，中國軍隊開始了歷時八年的對日全面抗戰。八月八日日本侵略軍開進北平城前，凌晨一點多鐘，舉家逃離北平。出發時，下着小雨，街上沒有人，這座即將被敵軍佔領的古城萬籟俱寂，情況淒楚。一到車站，人聲鼎沸，出現了一片嘈雜景象，都是逃難的。尚未痊愈的王元化被家人扶上火車。平時到天津只需二三個小時，那天火車走了一整天。當時傳說日軍要抓知識分子，所以逃離北平的人都不敢攜帶書籍、鋼筆，也不敢戴眼鏡。但王元化瞞着家裏人，仍將他自己畫的一幅魯迅像和兩冊《海上述林》裝入小箱中，帶着上路。在天津站，日本兵和便衣隊排成兩行長列守在出口，中間僅可容單人經過，發現形迹可疑者就將人帶走，氣氛非常緊張。王元化看了深感痛辱。全家在天津租界候船，約一個多月後，始購得船票，輾轉到上海。王元化在《記辛勞》中說：“抗戰初我剛剛從北平到上海，參加了平津流亡同學會，做一些聯繫文藝界的工作。”不久考入大夏大學攻讀經濟專業。

王元化小時，父親逐月給他存一筆錢作為將來出國留學費用。但他違背了父母要他讀理工科的願望，走了另一條道路，使雙親感到失望與擔憂。在上海，家裏延請周班侯教授王元化英文。周授他丁尼生、柯勒律治等所著詩文。又延請任銘善教授他國學。任授他《說文解字》、《莊子》、《世說新語》等。王元化將自己寫的文章請任先生評閱，任說他寫得不好，文氣急促。王元化後來寫文章注意文氣大約與此有關。

開始文藝寫作。先後用筆名洛蝕文、佐思、方典、函雨等。第一篇作品《雨夜》發表在《文匯報》副刊《文會》上（後收入《腳蹤》）。王元化在《腳蹤序》中說：“本集所收的《雨夜》就是我寫的第一篇作品。後來，我陸續寫了一些習作，其中主要是文藝理論，但偶爾也寫點創作。我的第一篇小說《南行輪上》是寫平津淪陷後在一條駛向上海的輪船上流亡人群的景象。它發表在當時上海學聯主辦的一本特刊上。這篇小說現在已無法覓得。”

十一月，國軍西撤，上海租界淪為“孤島”。

結識張可。張可原名張萬芳，在暨南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出身蘇州世家，祖父張一鵬、伯祖父張一麐，均在北洋政府任過職。

不久又結識張可哥哥滿濤（原名張逸侯）。滿濤早年赴日本學經濟，後由日赴美攻讀化學。王元化在《清園論學集序》中說：“抗戰初，我結識了滿濤，他從美國經歐洲返國。由於共同的愛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一九三八年 十八歲

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隸屬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這時期沙文漢是省委宣傳部長，孫冶方是文委書記，顧準是文委副書記。

在上海戲劇交誼社工作。與楊帆、鄭山尊同在一個黨小組。

撰《論抗戰文藝的新啓蒙意義》(收入《抗戰文藝論集》)。文中說：“這並非是五四啓蒙運動的簡單再現。我們可以把它中心內容總括為下面兩點：一、民主的愛國主義，二、反獨裁的自由主義。”又說：“新啓蒙運動所以提出理性這口號，實是它必須抑制無謂的感情衝動，反對任何籠統的幻想，才能達到認識現實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 十九歲

年初，隨上海各界救亡聯合會組織的慰問團赴皖南新四軍進行慰問。行前，撰《出發》，刊《每日譯報》(增刊)第三期(未收集內)。王元化在《癸酉日記》中提到此次出行所留下的印象：“從溫州到金華，由於公路被破壞，乘民船在甌江溯江而上。船抵青田過夜。青田是一座臨江的小山城，建在半山腰，下船要爬上一段長長的石階通道，半途還要經過一座用石塊壘成的門洞。到了門洞上面，有個平臺，坐在那裏可以眺望四周的風景。這座不滿百戶人家的小山城，被氣勢宏偉的崇山峻嶺所環抱，甌江的清麗江水在下面平靜舒緩地流着。太陽落山後，天空的晚霞漸漸轉暗，巍峨的群山籠罩在一片絳紫色的暮靄中。青田的美麗令人陶醉。”又在《記辛勞》中稱：“一九三九年初我隨上海慰問團到了皖南新四軍軍部，在服務團時，我被安排住在辛勞那個單獨院落裏。”

回滬後，根據在皖南所收集的材料撰長篇論文《藝術·宣傳·宣傳戲劇》(未收集內)。撰報告文學《出征》(收入《腳蹤》)。

調至文學黨小組。當時，黨的文學小組有兩個，分別由戴平萬、林淡秋各任一個小組的組長。小組成員有鍾望陽、林珏、蔣錫金、蔣天佐、東紉秋、蕭岱、趙不揚、王元化。

孤島開展了文藝通訊運動，二月，王元化以洛蝕文筆名在《華美晨報》副刊《浪花》上發表《關於文藝通訊》一文。文章連載三期，論述了“文藝通訊的意義”、“怎樣做一個文藝通訊員”、“怎樣寫文藝通訊”等問題(均未收集內)。王元化在文藝通訊運動中負責組織工作，鍾望陽負責宣傳工作。

三月，編輯出版了《抗戰文藝論集》(後編入《民國叢書》)，岳昭(戴平萬)作序。論集分第一輯“關於抗戰文藝”，第二輯“關於藝術大眾化”，第三輯“報告文學及其他”，以及一個“附錄”(三篇文獻)。收入茅盾、老舍、馮雪峰、周揚、胡風、林淡秋等文章三十五篇。

十月，在《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三輯《魯迅逝世紀念特輯》上發表長篇論文《魯迅與尼采》(收入《文藝漫談》、《向着真實》)。叢刊編者戴平萬在編後記中指出：“《魯迅與尼采》的作者，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以這樣的年齡，而能有這麼嚴正的精神來治學，真是可敬。雖然在這篇論文中，對尼采的個性解放，在某一階段的革命性，估計尚不充分，多少有點機械味兒，但對於魯迅先生的思想分析，却非常正確。”事隔三十多年後，王元化在《向着真實》再

版《後記》中提及此事說：“我當時正年少氣盛。當平萬同志見面徵詢我的意見時，我竟頂了回去。現在我還記得他那有些失望並對我寬容的臉色。”

一九四零年 二十歲

在《戲劇與文學》上發表長篇論文《現實主義論》（收入《文藝漫談》）。

撰《金瓶水滸傳辨正》（收入《文藝漫談》。後經修訂收入《清園論學集》）。

此時王元化讀了《海上述林》介紹恩格斯關於現實主義的理論，初步認識到藏原惟人從蘇聯拉普派所傳來的所謂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二元論的偏頗。

一九四一年 二十一歲

撰報告文學《乞丐收容所》（收入《腳蹤》）。

撰《讀書偶記》（收入《文藝漫談》）、《讀書偶記續編》（收入《向着真實》）、《爭取批評》（未收集內）。

三月，上海地下黨文藝總支由黃明任書記，王元化分管《奔流》文藝叢刊。該刊後改為《奔流新集》。參加編輯工作的有樓適夷、滿濤、錫金，編輯部設在滿濤家裏。樓適夷《記奔流叢刊與奔流新集》一文說：“一九三九年春，文學界部分同志組織了一個經常性的小型座談會，參加者包括黨員和非黨的文學工作同志，先後有林淡秋、蔣天佐、鍾望陽、戴平萬、辛勞、林珏、王元化、越薪（束紉秋）、蔣錫金、趙不揚、孫石靈、滿濤（張逸侯）、吳巖（孫家晉）、辛未艾（包文棟）等同志。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先後辦過《奔流叢刊》和《奔流新集》兩個刊物。……《奔流叢刊》是孤島時期直接受地下黨領導的唯一文學刊物。撰稿人除座談會同仁外，還有仇山（唐弢）、柯靈、朱維基、姜椿芳等。那時國民黨頑固派標榜所謂‘抗建文學’，敵偽方面則叫嚷所謂‘和平文學’。‘抗建文學’派認為我們揭發了抗日陣營的內部磨擦，是幫助敵人破壞抗戰的。《叢刊》第五輯發表了佐思（王元化）的《民族的健康與文學的病態》，便是針對他們寫的。於是他們發動了受頑固派豢養的許多刊物，對我們實行‘圍剿’，並通過當地反動勢力，沒收了我們的刊物。使第六輯延遲了一個月才得出版，而且這以後也終於無法繼續而成了終刊號了。此後，我們的活動進入更艱苦的階段，參加座談會的成員，大部分陸續離開孤島調赴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奔流社堅持在孤島的同志已經寥寥無幾。針對這一現象，決定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你拿十元，我出五元，集腋成裘，自籌資金，義務勞作，不付稿酬的辦法，繼《叢刊》而辦了一個小小的刊物，那便是《奔流新集》，那時候則已到了離太平洋戰爭爆發只有一個多月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份了，因此它也就成為上海孤島時期最後一個公開的進步文學刊物了。”

五月，撰《民族的健康與文學的病態》（收入《向着真實》）。

七八月，成立文藝工作委員會，黃明任書記，王元化、吳小佩為委員，王負責聯繫原文藝總支。

十月，撰《論掩蔽、彎彎曲曲、直截地戳刺》（收入《向着真實》）。

十一月，以佐思筆名在《奔流新集》第二輯《橫眉》上發表《禮拜六派新舊小說家的比較》